

宣教先鋒—— 莫拉維弟兄會

編輯室整理

在威廉克里(William Carey)於1793年乘船前赴印度、戴德生(Hudson Taylor)於1853年抵達中國之前，已有一群不怕吃苦的基督精兵，在世界各地努力傳揚基督福音，他們就是莫拉維教會的信徒。1732年，陶匠多白爾(Leonard Dober)和木匠尼亦曼(David Nitschmann)由中歐薩克森(Saxony)山區的一個小基督徒社區出發，抵達西印度群島的聖湯馬斯島(Island of St. Thomas)。之後20年間，莫拉維宣教士的足跡遍及格陵蘭(Greenland, 1733)、北美印第安區(1734)、南美蘇里南(Surinam, 1735)、南非(1736)、北極的薩莫耶德人(Samoyedic, 1737)、阿爾及爾(Algiers)及錫蘭(Ceylon)和斯里蘭卡(Sri Lanka, 1740)、中國(China, 1742)、波斯(Persia, 1747)、阿比西尼亞(Abyssynia, 今埃塞俄比亞)及加拿大東部拉布拉多半島(Labrador, 1752)等地。在其後的150年，至少有2,158位宣教士被差到海外。如今，莫拉維教會遍佈全球，約有72萬信徒，仍堅持著普世宣教。

1735年，莫拉維信徒踏足在北美的喬治亞州，1741年在費城附近購地500頃，建立了宣教站伯利恆，稍後透過在美洲佈道的懷特菲德(George Whitefield)協助，再購地5,000頃，建立了另一個宣教站拿撒勒，更逐步向外拓展到賓夕凡尼亞、新澤西及馬利蘭等州各地，並向美洲土著傳福音。

在十八世紀，這個細小的教會帶動了敬虔運動，使歐美的教會得到復興；也激發了幾個差會的成立，如威廉克里的浸信會傳道會(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)、差出馬禮遜(Robert Morrison)的倫敦傳道會(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)等。莫拉維教會籠罩著一股宣教的熱誠，歷久不衰，為新約之後的普世宣教事工，創下了史無前例的紀錄。



且讓我們看看他們如何創下這些記錄。

艱苦奮進，堅守信仰

莫拉維教會(Moravia Church)，或稱為合一弟兄會(Unitas Fratrum)，追溯他們的歷史，要從第九世紀中葉開始。兩位東方教會(希臘正教)的教父區利羅(Cyril)和麥托丟(Methodius)把福音帶到波希米亞(Bohemia)及莫拉維(Moravia)地區(即今捷克共和國所在)，並以當時通用的語言來翻譯聖經，又引介了一套國家教會禮儀。這個地區的教會漸歸於拉丁教會(羅馬教會)所管轄，至十三世紀，當地的捷克人對此越來越不滿。

著名的改革者約翰胡司(John Hus, 1369-1415)，是捷克人，為布拉格(Prague)大學的哲學系主任，亦擔任當地伯利恆堂傳道，深受學生和群眾所愛戴，而教會亦成為當地熱烈討論改革的場所。可惜胡司所倡導的改革被視為叛教，因而被革除教籍和罷黜聖職，更在君士坦丁堡會議上被判為異端，綁在柱上活活燒死。但這兩個地區的人民延續胡司的改革精神，自組教會。1457年，一群胡司的跟隨者聚集在波希米亞西部，距離布拉格以東100哩的一條小村內，成立了弟兄會，並且有自己的聖詩、要理問答，也有譯為當地語言的聖經。60年後，1527年馬丁路德推動教會改革的時候，弟兄會已有20萬會眾，400個教區。

1547年，羅馬教廷的反改革運動，加速了弟兄會在波蘭的擴展。1557年，波蘭與波希米亞、莫拉維成為三個大教省(Provinces of the church)。然而，在1618-48年的「三十年宗教戰爭」裡，弟兄會受到劇烈的逼害，而波希米亞的改教派信徒，亦在1620年的「白山之戰」(Battle of White Mountain)慘敗。幸得柯墨紐斯主教(1592-1670, John Amos Comenius)經年流亡英國、荷蘭，領導群眾作「隱藏種籽」(Hidden Seed)來持守信仰，弟兄會才得以保存。

1722年，一些弟兄會的家庭從逼迫中逃脫到了德國，得到伯爵親岑多夫(1700-1760, Nicolas Zinzendorf)的庇護，在伯帖勒多弗(Berthelsdorf)安頓。這位奧地利的貴族，自幼受家庭教育薰陶，從少便接受基督救恩，是位敬虔的信義會(Lutheran)信徒。他讓莫拉維信徒建造安居之所，並將該地命名為赫仁護特(Herrnhut)，是「守望屋」之意，因為莫拉維信徒蒙「上主看顧」。隨後的五年，神的恩典和愛如潮水般覆庇他們，其中一位成員這樣寫道：「整個地方代表著神在人中間建立了會幕，到處只有喜樂和歡欣！」親岑多夫成為他們領袖，不但鼓勵信徒持守弟兄會的紀律，更挑戰他們將福音傳到遠方。莫拉維聖約(The Moravian Covenant For Christian Life)也在這時訂立，各地的弟兄會至今仍然持守，凡莫拉維弟兄會的信徒，都要有敬虔而守紀律的基督徒生活。

約翰衛斯理(John Wesley)就是受到他們這種敬虔的態度所影響，靈性得以復興。1735年，衛斯理遠赴美洲喬治亞州宣教，在船上遇到一群莫拉維亞信徒，他們敬虔服侍的態度和行為，面對死亡亦不畏懼的勇氣，震撼了衛斯理。1737年，衛斯理因為宣教得不到果效，從美洲失望而回，認識了莫拉維亞弟兄會的年青傳道人彼得波勒，彼此談到「因信得救」，因而使衛斯理覺得自己的信仰根基淺薄，在稍後的一次聚會中，神的靈在他心中動工，確信自己已因信得救。

欣然順服，坐言起行

莫拉維信徒欣然接受宣教士的使命，當1728年親岑多夫提出到海外宣教的計劃，26位肢體即時立約，為獻身禱告。正如哈利布爾(Harry Boer)所說，像一個健康的有機體，回應自己生命的規律；

弟兄會無論聖職人員或信徒，都以廣傳福音為己任。神就為他們以後的事情鋪路；多爾白和尼赤曼在基斯強六世(King Christian VI)加冕的時候到訪丹麥，遇到了來自聖湯馬斯島的非洲黑奴安當(Anton)的挑戰，願意委身事奉。對他們而言，這是基督徒生命中最自然不過的順服。

十九世紀著名的歷史家湯普遜博士(Dr. A.C. Thompson)，在莫拉維差會早期的歷史中寫道：「向外邦人傳福音的任務人人皆曉，任何參與者都會認為是尋常不過的工作……不需要廣泛宣揚，也稱不上甚麼偉大的事情。」

如此默默耕耘，與今天大事宣揚的差遣場面相比，形成很強烈的對比！十九世紀的英國莫拉維差會秘書 Ignatius Latrobe 牧師寫道：「我們犯了一個很大的錯誤；當受到委任後，宣教士即受到公眾注目和尊崇；因著他們對神的委身，受到無比的讚賞。他們還未作任何刻苦的工作之前，已在會眾面前被視為殉道者和堅守信仰者。我們寧願勸他們悄悄出發，叫會眾以熾熱的禱告支持……」沒有喧鬧，沒有豪情，也沒有宣傳，只有一顆熾熱、不炫耀的心，願意將神的名在未被稱過的地方傳揚；這就是莫拉維教會的精神。

熾熱的心，朝向基督

莫拉維信徒澎湃熱誠的宣教動力，來自一股對基督深切的、不間斷的愛，這種愛在親岑多夫的生命中表露無遺。他對宣教充滿熱誠，早在求學時期已與朋友成立「芥菜種子會」(The Order of the Grain of Mustard)，要向世界宣揚基督的國度。

他不單鼓勵信徒要到世界各地傳福音，自己亦多次到海外宣教。他說：「我有一股熱誠，就是為基督，只為基督。」這股熱誠動人心弦，在他所寫的2千多首詩歌中迴盪不已。

英國社會改革家威伯福士(William Wilberforce)曾這樣形容莫拉維的信徒：「他們是一個身體，以忠心和熱情服侍，較任何人更實在地證明基督的愛。這種經過深思熟慮的熱誠，因順服、親切而顯得溫和，因勇敢與堅持而勇往直前；這勇氣不因受阻撓而退卻，這堅持不因艱苦而磨滅。」今日，我們需要一套完整的神學理論，作為宣教的動力，並充份掌握我們的信仰；但若失去了對基督的熱愛作為一切行動的根源，則只是在世上



橫衝直撞，製造噪音而已。

面對危難，處變不驚

威伯福士也指出莫拉維弟兄會另一個特點，他們以不尋常的勇氣面對無法預料的逆境和危險。他們接受艱苦，認為神差他們前往的人群所過的生活，是不可避免的代價之一。他們切實履行保羅所說，「向甚麼樣的人，我就作甚麼樣的人」(林前九 22)，在宣教史上無人可比。

大部分早期的宣教士都是帶職宣教的，大多像多白爾和尼赤曼一樣，是工匠和農夫，只帶備出發時所需的費用。在一些白人統治的地區(如牙買加和南非)，白人養成一種優越感，但這群宣教士卻謙卑地承擔體力勞動的工作，見證了信仰。一位名叫望彌德(Monate)的宣教士，早年在南非的東部省，曾為建造一座玉米磨坊而親自砍割了兩塊大沙岩，不僅令他服侍的卡非爾人(Kaffirs)驚訝不已，更促使他在工作時能與卡非爾人「閒話」福音。

到蘇里南和西印度這些地方去，等於面對疾病或者死亡；早期的宣教士付出了無可避免的犧牲。例如在圭亞那(Guyana)，160位宣教士之中，75位因染上熱帶的熱症或中毒而死，如安德魯烈治文保加(Andrew Rittmansberger)在抵達六個月後，便在島上身亡。在首批到達格陵蘭的宣教士中，其中一位寫了一首詩歌，真實反映了他們的態度：「看啊！踏遍冰雪，為救主基督尋回失喪靈魂。喜樂啊！承受貧憂，為被宰羊羔遠征無涯之境。」

沒有足夠的工具幫助，莫拉維信徒堅毅地學習新語言，更有部分宣教士能精通當地的語言，克服

了所面對的艱辛。今天，我們可能面對不一樣的考驗，但需要具備由神而來的勇氣，卻是永不改變的。今日這個優遊的繁華盛世，是否製造了一群意志較薄弱的人呢？

意志堅決，不屈不撓

莫拉維宣教士表現出崇高和百折不撓的精神，但有時也陷於困境之中，不得不立即放棄任務而離開；例如在1854年，因澳洲的尋金熱而引起當地人衝突，宣教士突然要放棄土著的事工。

有名的莫拉維宣教士蔡斯伯革(David Zeisberger)，自1735年起在北美東部休倫(Huron)等部族之中工作了62年。1781年8月的一個主日早上，他以賽六十四 8 為題講道後，教會和園子受到連群結隊的印第安人所攻擊。在連天的大火中，蔡斯伯革失去了所有的譯經手稿、詩歌和印第安語文法的詳盡筆記。蔡斯伯革謙恭低頭，降服在神的安排下，再次誠心埋首工作。多年後，在印度的威廉克里也同樣於一次大火中遭遇相似的損失。

今天，我們是否欠缺宣教的毅力呢？那些願意為神「破斧沉舟」的人在哪裡？我們經常看面前的問題，如子女教育，又或等候神的指引修改宣教策略；但我們若要贏得別人的靈魂，信徒切實受到造就，教會在基督內有完備的生命，在某些地方必須有「堅持宣教的力量」。

誠然，莫拉維宣教士也有其弱點，就是過份集中傳福音，而忽略了建立教會，在訓練基督徒領袖方面不足。他們集中發展「宣教站」，甚至以一系列的聖經地名來命名，如示羅、撒勒法、拿撒勒和伯利恆等。由於他們坐言起行和順服的性格，早期的宣教士大多從工作崗位直接出發，未有周詳的預備。事實上，直至1869年，他們才在距離赫仁護特20公里的彌斯堅(Nisky)，成立第一所宣教訓練學校。

無論如何，韋歷(J.R.Weinlick)認為我們要向莫拉維弟兄學習的一課，就是：「莫拉維教會首先視這項工作為全教會的責任，而不是把這責任留給社會或特別有興趣的人。」

資料來源：

〈歐洲的莫拉維弟兄會——開荒宣教的先鋒〉《普世宣教運動面觀》，大使命中心2006年。

網頁 www.moravia.org